**第二屆台灣研究博碩士論文獎**

**日治時期臺灣洋裁的移入與發展**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大木言葉

**摘要**

**一、研究動機**

**1.研究動機**

本論文要討論在日治時期西方的洋裁技術如何傳播到近代臺灣社會中的過程，以及洋裁新技術對於臺灣婦女的影響。

在傳統社會中，準備家人的衣服是婦女的重要工作之一，因此戰前出生的大部分婦女都會縫製衣服。她們大多從母親哪裡學習裁縫，但是日治時期以後臺灣人開始穿洋服，而從母親那裡學習來的裁縫技術與新的洋裁方式也不太一樣，所以孩子只好在外面學習洋裁技術。為什麼臺灣人脫離傳統的服裝，而開始穿洋服？新時代的女孩子們是在哪裡學習洋裁的技術？洋裁對婦女和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以上是我研究日治時期臺灣洋裁的主要動機。

早期臺灣漢人多數移民自中國閩、粵兩省，生活習慣與風俗多承襲原居地之母文化。移民初期，臺灣漢人社會習俗與中國類同。當時臺灣人口比率，男多女少，與中國不同，臺灣的女性不從事紡織，也沒有紡織的布料。因此，傳統臺灣女性比較重視刺繡，因為當時臺灣人認為擅長刺繡的女性比較容易取得好的姻緣。

1895年日本統治之後，臺灣社會出現非常大的改變。文化方面也受到日本的影響，其中臺灣人的服裝改變是值得關注的事情。臺灣經由日本的影響陸續出現更多西方的東西。統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沒有特別限制臺灣人的服裝，但男性斷髮、婦女解纏足之後，他們的服裝也出現變化。「洋服」的出現，臺灣社會逐漸接受從西方來的服裝樣式，為了滿足當時服裝變化的社會需求，「洋裁」的技術繼而出現在臺灣社會。原本臺灣傳統社會重視婦女的刺繡技術，但日治時期之後，因為她們已經不纏足了，也開始去上學，穿著制服讓婦女體驗洋服，此時已經不是刺繡的時代，取而代之的是洋裁在社會上逐漸普及，並且在學校教授如何製作，而且婦女有這個技術就可以賺錢，也能自己穿時髦的衣服。因此洋裁給臺灣婦女的影響不只在於服裝的改變，也帶來女性社會地位的改變，婦女藉著其所擁有的技能，改變她們的生活價值。

本論文主要探討以下3個問題。

1在日治時期，洋裁技術如何被介紹到臺灣社會？

2 一般婦女在哪裡學習洋裁技術？

3 洋裁技術給予婦女的影響如何？

本文試圖從女性史、教育史及技術史的角度來思考，藉由史料、回憶錄以及報紙內容，分析日治時期臺灣婦女學習裁縫技術的情況，考察洋裁技術被引進臺灣的過程，以及新技術帶給臺灣婦女的影響。

**2.研究回顧**

 從臺灣女性史與教育史、服裝變化、家政與裁縫等三個面向，分析既有的相關研究成果。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是早期女子教育的代表作。該書整體研究日本統治下女子初等、中等教育的建立與發展，從傳統女子教育、婦女生活，到日治以後女子教育制度建立的過程及課程內容，更重要的是透過各種資料、訪談，探討女子從學校畢業後的就業情況及社會參與，藉此理解清代至日治時期臺灣女性在社會地位的變化。洪郁如《日本の植民地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近代臺灣女性史》一書，從「新女性」的出現考察女子教育的意義。這裡所說的「新女性」是指已脫離纏足等舊式習慣，接受由日本帶入新式教育的女性，主要是對高等女學校畢業生的稱呼。這些新女性多與臺灣社會菁英結婚，透過母親和妻子的角色，影響到菁英階層的家庭，以及她們的先生與下一代的臺灣人男性。山本礼子《植民地台湾の高等女学校研究》一書，是以第三高等女學校畢業生的問卷調查為中心，探討高等女學校的真實情況。

探討洋裁普及的時候，必需了解日治時期以來服裝的變化。而服裝穿著的改變又與洋服的出現密切相關。吳奇浩〈洋風，和風，臺灣風：多元雜糅的臺灣漢人服裝研究（1624-1945）〉，是目前研究1945年之前的臺灣服裝中，最完整的一本論文，清楚爬梳清代到日治時期臺灣漢人服裝的變化。台灣服飾的發展過程中，文化的流向是中國流向臺灣，臺灣學習中國的服裝。在布料方面，因為臺灣的婦女不紡織，而出現布料也依賴從中國進口的情況。到了日治時期，男生從頭、女生從腳開始西洋化。因為男性接觸外面的機會較多，因此比較早出現變化。臺灣服的裁縫方法上也出現不同的地方，女生主要在鞋子上出現和西洋鞋一樣的裁製方式。大約1920年代之後，陸續看得到上階層的婦女開始穿著洋服，1930年之後洋服更為流行。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從上海跟日本學習服裝流行，尤其旗袍受到臺灣婦女的歡迎。但1937年日中戰爭開戰，在戰爭體制下的臺灣，旗袍與臺灣服被認為是敵對國的象徵，因此總督府推進和服與改良服。

葉立誠，《臺灣服裝史》，解析臺灣從史前時代到戰後及20世紀的服裝變化。在日治時期的部分，利用日本領臺至1945年戰爭結束之間的大量舊照片以及當時日本官方人物和臺灣知識份子留下的文章來分析描述臺灣人的服飾演變。陳佩婷〈台灣衫到洋服—台灣婦女洋裁的發展歷史（1895年-1970年）〉，探討為何臺灣人會放棄傳統的長衫而穿上洋裝。洋服的風行與洋服技術的引進，刺激起西式服裝的需求，不僅改變臺灣人的日常服裝，也改變了傳統臺灣的服裝製造技術。瀧澤佳奈枝〈日治時期台灣的技藝教育—以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為中心〉，探討第三高等女學校的技藝教育。日本領有臺灣的初期，臺灣社會仍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概念，很少人送女兒上學校，因此臺灣總督府藉由技藝教育，勸誘臺灣女生上學。日治前期在學校教授的裁縫是以臺灣式裁縫為中心，1920年之後，陸續出現洋裁教授。由於臺灣的氣候與風土適合洋服，因此洋服迅速成為臺灣人的日常服裝，後來洋裁成為裁縫課的主要教授內容。榎本美由紀〈日本統治時期台湾の家政教育〉，從高等女學校、家政學校、職業學校、社會教育等方面來討論日治時期臺灣的家政教育。她主要分析家政學校設置的過程、目的、增加的理由，以及家政教育的內容，並探討家政教育的結果帶給臺灣社會的影響。1920年代，臺灣社會經常討論家庭生活的改善，也認為社會的改造需要改善教育婦女之能力。為了改善近代家庭，民眾認識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女子教育逐漸普及。高等女學校的課程中，家政科目是一定會設置的科目，但對於高等女學校與家政學校的家政科內容沒有很大的差異。

**3.研究材料與架構**

關於裁縫的史料並不多，洋裁的部分更少。例如，私人的洋裁店與洋裁學校的資訊幾乎不存在官方於的史料中，因此本論文主要參考日治時期的報紙、雜誌，以及其他相關的史料。除了當時報章雜誌的報導之外，關於吉見裁縫學校創建過程，相當依賴創建者吉見まつよ的回憶錄。吉見個人的回憶錄，必然有其個人的立場及觀感，或有其偏頗之處，但對於學校創建過程的重建，在資料有限的情況下，仍具有相當的價值。

《臺灣日日新報》於1898年合併《臺灣新報》與《臺灣日報》成立。是日治時期發行時間最長的報紙，也是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最高發行量曾達五萬多份，是在臺灣工作的日本人、熟悉日語的臺灣人都要訂閱的報紙，是能夠了解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第一手資料。《臺灣婦人界》創刊於1934年（昭和9年），至1939年（昭和14年）結束，共發行57期。雜誌的主題內容相當豐富，討論的內容包括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結婚問題，介紹活躍於臺灣社會的婦女。與女性生活相關的料理、化妝、手藝、洋裁、家計等也一應俱全。《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沿革誌》是愛國婦人會於1904年（明治37）在臺灣設置愛國婦人會支部，其主要任務有兩個：第一協助山地武力控制，第二統合殖民地的婦女。對象包括臺灣女性和日本女性，對於臺灣女性，愛國婦人會設立了女子職業訓練所，後來經營女子職業學校，也讓許多上階層的婦女加入愛國婦人會。

在資料的運用上，使用與洋裁相關的出版品、學校檔案、個人的回憶錄、日記等，了解當時的狀況有所幫助。日治時期臺灣婦女的回憶錄，其數量沒有男性的多，不過內容都很精彩。本文訪問到1932年（昭和7年）出生於西螺的廖良美女士，父親為西螺街長，西螺小學校畢業之後就讀台南州立虎尾高等女學校。從她訪問了解日治時期臺灣婦女學習洋裁的情形。

本論文的研究範圍是日治時期（1895~1945年），從教育、女性以及洋裁的社會意義三方面，著手分析探究三者的關係。研究架構，除了第一章緒論與第五章結論之外，共分為三章。第二章主要介紹教育機構中的洋裁知識傳播。第三章探討1930年代後家政學校增加的過程中，在台北出現一所大規模的私立裁縫學校─吉見裁縫學園。介紹吉見裁縫學園的創立經緯、教學內容以及其對臺灣婦女的影響。第四章探討裁縫機在臺灣的發展和移入。因為裁縫機的登場改變洋裁普及的速度，是探討洋裁時相當重要的物品，究明裁縫機何時在臺灣出現、如何普及到一般的臺灣婦女等等的問題。

**二、洋裁知識的傳播**

 日治時代之前的臺灣，女子通常沒有什麽機會接受教育。臺灣總督府盡力勸誘男女生到新式學校就學，但將兒子送到公學校讀的臺灣人，仍然選擇把女兒留在家裡，導致女性兒童的就學率從一開始就遠低於男性。當時的教育當局讓臺灣女性本身想就學的方策是，學校課程包含臺灣女性喜愛的手藝課程，舉辦只以臺灣女性對象的展覽會，利用裁縫、手藝科目是勸誘就學的方法之一。不過臺灣總督府並沒有編纂正式的裁縫家事教科書，但目前可以看到二份1910年代的教案，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此時期公學校裁縫課實際教學內容及進度。第一份資料是長期從事女子教育的大橋捨三郎所撰寫的《臺灣公學校六個年程度裁縫科教授細目案》，為當時公學校裁縫科的主要參考資料。從這篇資料可以知道，1912年（大正1年）時的裁縫科運針方法、縫製方法都使用臺灣語的稱呼方式。每個學期的開始到結束，老師都要注意學生的姿勢、整齊清潔、教具、材料、關於衣服的知識以及洗衣、保存方法。

1912年（明治45年）在公學校教授的裁縫科以臺灣式裁縫為主，要縫製的作品都是臺灣服所需要的東西，不過也可以看到一些像日本式服裝的東西，類似日本和服裡面穿的貼身內衣。為配合地方的需要，學生可以依自己的需求裁縫纏足或放腳的鞋子，當時官方鼓勵臺灣女性放腳，但是政府的要求與實際上的教學內容不太一樣。她們在課堂上的一些專門用語也是採用臺灣語，因為要縫製的東西是臺灣服為。也可以說，裁縫科的系統尚未完成，材料、設備、師資都不足，按照每個地區的情況，由每個教師來決定使用什麽樣的布料還有時間的分配。雖然總督府有規定怎麼教授裁縫科，內容及進度都有統一標準，但最後還是讓學校自行決定。第二篇《公學校教授要目第二篇 農業科，裁縫及家事科》(1913)是以前者為基礎改良而成，兩者內容沒有很大的差別。裁縫科教學裡面不只裁縫，家事和手藝也被包含在裁縫課，家事的教授內容以洗衣法及衣服的保存法等，與裁縫科互動連結教授的東西相當多。像在課堂上製作的衣服，依材料的不同來選擇洗衣的方式等。

**1.日治後期的公學校裁縫科**

1928年（昭和3年）在《臺灣教育》雜誌上，刊載一篇關於公學校裁縫科的文章，是臺北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教師井ノ口シゲ寫下自己在公學校教授裁縫科的經驗。她認為公學校的裁縫科比其他科目落後，應該要深深的研究一下。從她教授裁縫的兩年經驗中，推廣裁縫科不振的原因大約有兩個：第一材料不足，第二學校沒有裁縫科的設備。材料問題的主要原因為，父母親對學校裁縫科的理解不足，或對學校裁縫沒有信心。再者學生和父母都不知道該準備什麼布料，就算知道，因為離城市太遠也不容易買到材料。

她擔任的第一學期，約半數的學生沒準備材料，其他學生準備各種各樣的東西，其中也有什麽都沒帶來的學生。有材料的學生，進度也不一定。要教授和服的時候，臺灣學生不理解和服，但完全沒有和服樣本。因此她認為學校應該有一個準備材料的系統，把裁縫的材料準備好，才能培養學生的創意。

施素筠女士是小學一年級的第二學期，1929年(昭和4年)時從鹿港公學校轉學到蓬萊公學校，她回憶當時裁縫課的情況。當時女性從小就有拿針的習慣。學習的內容有法國繡等，不僅只臺灣傳統的刺繡，也可以看到在裁縫科製作圍裙，在家事科煮飯時穿在身上，就是裁縫和家事的互相連接結上課。比較特別的是為了學校舉辦的展覽會，老師課外時間也教學生學習織毛線，可以推測她們在學校學習的內容相當豐富。

**2.高等女學校與家政女學校的裁縫教育**

 雖然第三高等女學校臺灣的學生較多，但她們的裁縫科做和服的時間很長，而且製作和服的布料價值不便宜。施素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學習和服的回憶，其他也有學習臺裁、洋裁，洋裁教的東西具有實用性。

 日治時期在全臺灣第一所職業學校是「台北女子職業學校」，為1920年前身是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的授產所，成為財團法人組織的職業學校，是臺灣第一個被政府認為屬於「實科高等女學校」的學校。

 另外，台南家政女學校的前身為台南裁縫講習會，地址位於臺南市東門町彌陀寺內，於1929年（昭和4年）4月17日，由日本龍谷大學畢業的住持王兆麟所創立的社會教育事業。該校為了充實實科，每週35小時中，裁縫手藝佔13小時，家事1學年的時候要上2小時的課，二、三學年的時候要上3小時的家事，其他的實習時間5小時。每科並招募專業教員來執教。

**3.海外職業學校的裁縫教育**

 有些婦女不是在臺灣學習洋裁技術，而是在日本學習裁縫技術才回來臺灣。《臺灣日日新報》的學校案內欄也常出現為了女性的學校介紹，其中也有一些家政學校，在臺灣也可以得取日本裁縫學校的招生訊息。

從施女士的例子而言，她是已經成為洋裁師傅以後，為了更提升自己的洋裁能力，而決定去日本學習洋裁設計。當時台南地區的洋裁學習環境還沒有到日本的程度，想要學習洋裁的話，去臺北不如去日本學習，有比較多的學校選擇，也有最新的洋裁設計。另外一位阿媽反而不是主動去，就是因為先生家的事業是賣高等女學校裁縫技藝科需要的東西，所以阿媽也需要一些洋裁的知識和技術，結果結婚不久就被婆婆送到日本去學習洋裁。在日本的一些洋裁學校，不一定要有洋裁背景也可以入學，進入日本的洋裁學校就讀其實比我們想像簡單。而且她們的回憶中除了自己之外，也有別的臺灣人，雖然不能說每個學校都有臺灣學生，但從日日新報中的學校招生廣告可以看到，有些日本裁縫學校也招收臺灣的學生。前往日本裁縫學校進修，也是臺灣婦女學習洋裁的選擇之一。

**三、專門的洋裁教育機構—吉見裁縫學園**

 日治時期的近代教育對臺灣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沒有機會受教育的婦人而言，影響更是深刻。1919年(大正8年)臺灣教育令發布，臺灣婦女的近代教育才算真正開始，當時的教學內容中三分之一是家政科目，因為家事對傳統社會的女性而言，是必須要做的事情，其中裁縫更被認為結婚的重要條件之一。

傳統臺灣的女红重視刺繡，擅長刺繡的女性才是條件好的新娘，到了日治時期，裁縫技術取代了刺繡。隨著婦女教育普及與國家經濟發展的需求，婦女也漸漸參與經濟生產勞動，在社會工作的婦女比只在家裡一直做家事的婦女更有經濟價值。許多民眾開始認為有經濟能力的婦女才是好的妻子。

當時一般中下階層的家庭，大部分的婦女只上完公學校，或是沒有唸完就離開教育場所，她們的生活都以家裡為中心。因為台灣傳統社會不重視婦女的教育，並將這些女性視為家庭重要的勞動力來源。隨著洋裁技術在台灣的推廣，婦女除了選擇負擔家務農作以外，也可以藉由學習洋裁技術，販賣西式洋裝，來幫助家裡取得額外的收入。女性開始可以在家裡兼職做洋裁，也有女性自己選擇開洋裁店，由此可知，洋裁是可以讓台灣女性取得經濟獨立的技術。那麼，這些女性是在哪裡學習裁縫的知識與技術？隨著臺灣人的服裝變化與裁縫機的出現，公學校與高等女學校也開始出現洋裁課程。不過在學校教的東西不夠豐富，真正想要學習裁縫的人會去洋裁講習會或私人開設的洋裁教室等。另一方面，1930年代以後，洋裝成了台灣婦女的日常服裝與時尚，傳統的女红式微，很多年輕女子開始到傳授洋裁的地方去學習現代洋裝的裁製技術。許多女性想要學習洋裁的情況下，學習洋裁已經是一種流行，居然也出現專門的學校。

日治時期的洋裁教育機構中，吉見裁縫學園是一所較大規模的裁縫學校。由吉見まつよ（Kichimi Matsuyo）女士於1930年（昭和5年）4月創設。其後一直持續到1945年日本統治結束，為台灣少數以｢裁縫學校｣為名的正式學校。

 吉見まつよ大約1927年(昭和2年)左右跟著他的先生遷渡來臺。他的先生是吉見猛，為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英文教師，也是後來的吉見裁縫學園董事長。他們曾經養育了三個小孩，不過三個小孩出生不久過世。他們在臺灣的生活雖然很愉快，但是越愉快越覺得沒有小孩，只有跟先生兩個人的生活，讓她想起失去小孩的悲哀。在這個時候，因為先生在台北第一女學校教書的關係，有人拜託吉見まつよ來指導洋裁技術。吉見まつよ也曾經在第一高女講習科指導過洋裁。

一開始只有招收日本學生的學園，後來馬上有臺灣婦女表示想要就學的意願。臺灣女性申請入學的時候，有些日籍老師反對她們入學，但吉見校長採取歡迎的態度，不反對她們來學習裁縫。因為想要入學的學生逐年增加，在ファロス裁縫學園創立第5年，即1934年（昭和9年）10月22日，吉見裁縫學園改建新校舍完成，也成為臺北市政府認可的公認學校，原本的校名「ファロス（pharos）裁縫學園」改稱「吉見裁縫學園」。

必修科目的部分，跟1940年的第三高等女學校的科目比較的話，第三高等女學校的科目以修身、公民科、國語、英語、歷史、地理、數學、理科、家事、裁縫、手藝、圖畫、音樂、體操、教育、園藝。由此可知，吉見裁縫學園的科目少了英語、歷史、地理、理科、教育、園藝，多了和裁與洋裁理論、以及跟洋裁相關的外來語，反映出吉見裁縫學園是以學習裁縫的技職教育為主要目標，這是跟高等女學校最不同的地方。學園也為畢業生開設了洋裝部，此洋裝部是為了學生畢業之後實習研究洋裁、和服的裁縫研究以及手工藝品的製造，培養學生的實作能力。吉見學校最大的特色就是校園裡增設開放給畢業生以及研究生的洋裁店，給予畢業生的實習機會，是為了將來能自行經營個人裁縫店，讓她們在這裡學習洋裁店的經營。

在當時臺灣少有私立學校的情況下，有這樣特色的學校，成為臺北市政府認可的公認學校之後，吉見裁縫學園從全臺灣招收新的學生，作為全臺灣如此有特色的學校，吉見女士也更進一步一心一意奉仕學校的教育工作。吉見裁縫學園可說是一所不論年紀大小的婦女皆可來此學習裁縫技術的綜合裁縫學校。在一般社會中婦女能活躍表現的範圍不大的時代，吉見裁縫學園的女學生們這麼生動活潑的原因是，她們在學校生活中體認出女性自身的價值，以及對生活、工作的滿足感與成就感。一開始沒有任何臺灣學生的學園，到了1938年(昭和13年)的時候突然增加了台灣學生。因為沒有關於學生人數的資料，而不能判斷準確的理由，不過可以觀察到隨著吉見園長知名度擴大，吉見裁縫學校也被大家所熟識，因此皇民化運動開始的1938年鼓勵女孩子去學校上課，確實有許多台灣女孩子申請該校，而且吉見園長也希望臺灣的女生多多來上課，因此有1938年突然增加臺灣學生。另外，也許女學生的父母親認為學得一技之長可以貼補家計，或是取得好姻緣，也就是學習具有實用性的教育取向，因此才讓吉見學園有更多女性的臺籍學生。

吉見裁縫學園在1935年（昭和10年）時日本籍學生佔台灣籍學生的一倍以上，不過休學率也相當高，入學一半以上的日本籍學生休學，畢業生的人數也不多。當時的女學生或許有入學之後結婚，就不能繼續上學的情形。1935年（昭和10年）改正學校規則的隔年1936年（昭和11年），台灣籍學生超過了日本籍學生。也許因為學校改正學則，而學校上課的內容像一般女學校，遇到升學問題的臺灣籍女學生來到吉見裁縫學校，她們把裁縫學校當做一個公學校畢業之後的升學管道。

在戰爭時期的日本國內，如何改革女性服裝以符合後方所需，當時成為熱門的話題，在制定所謂男性國民服的延長線上，婦女標準服的制定亦引發各種爭論。吉見裁縫學園在戰爭時期負責研究臺灣本島的服裝改善，身為院長的吉見まつよ為裁縫專家，而且學校的最大特色就是教授裁縫技術，所以在戰爭時期他們很積極參與了服裝改善的問題。在1938年（昭和13年）3月30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刊載，吉見裁縫學園將在4月2、3日舉辦學生的作品義賣會以及展覽會。隨著戰爭時局更濃厚，吉見裁縫學園也逐漸進入戰備時期，1940年（昭和15）10月26、27日，吉見學園開始舉辦新體制服裝展覽會。

這些展覽會給予地區民眾的影響很深刻，從服裝改善日常生活，這就是吉見院長的精神主張，不僅學生，就連地區民眾也團結起來，一起準備戰爭時期的生活，鼓勵改善戰爭生活下的服裝穿著，就是私立裁縫學校奉獻國家的方式。除了改善服裝的問題之外，吉見裁縫學校也配合著戰局修改上課內容，從事作業服務，如修繕衣服、製做千人針及耕作地瓜。當時臺灣人的服裝是大家關心的話題，是因為日本政府想要推行皇民化，臺灣也要跟日本統一化，除了精神方面以外，外表也要像日本人。1940年1月的時候，日本已制定所謂男生要穿政府規定的國民服，但是女性沒有政府規定的服裝，因此常被討論婦女的時局服裝問題。吉見まつよ以裁縫學校院長的身份，很積極參與服裝的改善問題，也可以說服裝改善就是最能發揮她的知識。雖然標準服在臺灣的普及程度相當有限，雖然各種報紙雜誌討論了很久的婦女標準服，但最後臺灣的女性選擇的與日本女性一樣，就是燈籠褲。

到了戰爭末期，因為吉見裁縫學院的地址在兵舍後面，因此受到空襲的災害。吉見まつよ回憶，當時每天卻感到生命危險，因此她們讓學生先疏散到沒有空襲的鄉下，學校也暫時停課。但是吉見まつよ與家人留在台北守護學校。當時因市內的醫院關閉，醫師都在學校治療受傷的人，裁縫學校變成醫院。後來每天來到講堂的醫師也都疏散，只剩下院長一家人。吉見まつよ遇到好幾次危險，空襲也越來越嚴重，台北市區主要的建築物都被炸掉，她的想法也逐漸出現改變，就是學校院長活下去才能守護學園，暫時讓學園疏散到安全的地方才對。因此她馬上在汐止的山莊蓋疏散家屋，借租附近小學校當做疏散學校，不過決定要去汐止的時候，聽到「玉音放送」廣播才知道日本戰敗，戰爭終於結束了。

**四、裁縫機在臺灣的發展**

關於洋裁，不可或缺的東西就是裁縫機。裁縫機並不是什麽種類的衣服都可以縫製，裁縫機不太適合使用在和服製造，因為和服的洗衣方法是將縫紉好的部分都解開才可以洗，因此使用裁縫機的話，縫線太硬，解開的時候太麻煩。手工的縫線反而較容易解開。由此可知，裁縫機主要使用於洋裁。

裁縫機是為了洋裁發明的機器，隨著服裝的變化，臺灣也出現裁縫機的存在。關於裁縫機，全世界最大的裁縫機公司「勝家裁縫機公司」(Singer  Manufacturing Company)，1900年（明治33年）在日本開兩家分店，那麼在臺灣何時開始出現裁縫機？大家如何認識裁縫機的存在？在學校方面，他們在課堂上的裁縫機利用如何？

1941年（昭和16年）太平洋戰爭開戰之後，一般民眾的服裝開始出現很大的變化，大家開始穿國民服與燈籠褲，是比較像洋服的服裝。因此我們也要注意，服裝變化最大的戰爭時期。因為本文認為教授裁縫的地方不僅在學校，像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的職業介紹所開放給台灣的戰爭遺族婦女，她們的工作內容較多屬於洋裁技術，那麼她們的裁縫機使用狀況如何？本文各節將依照如上討論行文，此外，也試著了解裁縫機與洋裁的關係。

**1. 裁縫機的移入**

 19世紀中葉開始出現成衣產業的美國，在南北戰爭時期着手裁縫機的開發，美國的裁縫機公司已經進入競合狀態。到了20世紀之後，裁縫機的世界市場大概分成以下三個，第一是美國勝家裁縫機公司，第二是德國製，第三為其他。其中美國的勝家裁縫機公司，日文以シンガーマニファクチュアリングカンパニー（Singer Manufacture Company）1900年（明治33年）的時候全世界佔七～八成的裁縫機市場，其中約八成主要是家庭裁縫機，大部分是女性使用。

勝家公司於1900年（明治33年）登陸日本，選擇在神戶和橫濱全日本最多外國人的居留地，開設日本第一家勝家裁縫機公司分店。

勝家裁縫機公司的販售範圍除了先進國家，也包含他們的殖民地，因此1895年（明治28年）起續日本統治的臺灣，除了從國外輸入的裁縫機之外，很可能也開始有裁縫機販售。在臺灣，勝家裁縫機公司第一家分店，設立於1904年（明治37年），當時臺灣的勝家裁縫機公司店都屬於日本的分店，日本的支店總支配部在神戶市京町，地址於臺北市本町2-60，店主任是丸毛喜代藏，資金為美金一千圓，勝家來到臺灣的目的是裁縫機的販賣及出租。由此可知，日本開始統治臺灣不到十年之內，勝家裁縫機迅速進入到新的市場，可以確認最早在1904年（明治37年）的臺灣就已出現裁縫機公司分店。

目前可確認勝家裁縫機第一次出現在媒體的時間是1906年（明治39年）的《臺灣日日新報》，該報曾介紹日本勝家裁縫機裁縫女學院的上課內容與其實用性。裁縫機裁縫女學院不僅教授裁縫機使用法，也教導基本的洋裁知識。三個月的課堂內可以學習裁縫機的使用法，以及裁縫機所製造的一些實用品。對婦女而言，若自己能做一家人的衣服，可以省下不少錢，對家庭的幫助相當大。其實，1907年（明治40年）可以看報紙的婦女可能沒那麼多，但勝家公司利用報紙刊登廣告，逐漸讓民眾認識裁縫機的存在。不過，勝家裁縫機公司真正的目的不是在於教授裁縫，他們真正的目的在於上完三個月或六個月的裁縫課之後，賣給學生裁縫機。1919年（大正7年）8月的時候，因為臺灣的勝家裁縫機公司的事業日益發展，也打算在臺灣設立支店（經銷商）。由此可知，勝家裁縫機公司在臺灣的推廣非常成功。不過因為當時的裁縫機是奢侈品，一台家庭用裁縫機大約兩百圓，所以並不是一般民眾想買就買得到的東西。根據王慧瑜〈日治時期台北地區的物資生活〉的研究，對中上階層而言，臺北地區日本紳士平均每人每天生活費為2.8圓，臺灣紳士則為3.6圓，兩百圓的裁縫機大約等於他們三個月的生活費，從此可知當時的裁縫機是相當昂貴。因此勝家的販賣對象是經濟環境不錯的家庭，月薪七十圓以上以及有小女孩的家庭。他們設定在每人口一千人的地區，標準要販賣五台裁縫機。後來勝家裁縫機公司的販賣範圍擴及臺灣全島，全島分成北部、中部、南部三個地區。臺灣的各分店把每週的營業報告給日本神戶總支配部，也要報告給台北支配部。

雖然勝家裁縫機公司受到臺灣婦女的歡迎，但他們公司的經營與販賣方法經常出現問題。在經營方面，他們員工的離職率相當高，因為員工的勞動條件並不是很好，大部分的員工成功賣出裁縫機，或收款後才拿到薪水。1932、33年（昭和7、8年）的時候，在日本發生過勝家裁縫機員工的罷工事件。在販賣方法方面，《台灣稅務月報》在1932年（昭和7年）的時候，報告說勝家裁縫機的貸款方式有問題，因為許多人利用分期付款，消費者首先要付二十圓的定金，其後各月五圓，花三年多的時間付款。但是他們的契約內容很嚴格，已經賣出去的裁縫機的所有權，得三年付款完全後才移轉到消費者，若中途放棄付款，已繳納的錢會被認為是裁縫機的使用費，不歸還消費者。總之，勝家裁縫機的月付貸款方式含有不合理之處，此外，在販賣方法方面也出現一些糾紛。

2**.國產裁縫機的登場**

自1930年代起，受到戰爭的影響，日本國內開始鼓勵推動國產品的開發與使用。其實在1920年代末至30年初期，少數日本國內的公司已開始開發自己的裁縫機，而且賣出不少台裁縫機。知名公司也相繼投入裁縫機的生產，這當中包括三菱、安井（後來的Brother）、パイン(Pine)（後來分成パイン與蛇の目Janome（車樂美））。三菱會社自1931年（昭和6年）起即開始生產裁縫機。如此日本國內1920年後期至1930年初期開始國產裁縫機興起，戰爭體制下的臺灣也是推進國產的裁縫機。國產的裁縫機最大的特色是「平價」，報紙上說國外製造的裁縫機「勝家裁縫機」1932年（昭和7年）的價格約一百九十五圓，而國產裁縫機只有約四分之一的價格，讓大家覺得非常便宜。

可知日本國產裁縫機大約1920年代後期開始透過商會等等的協助，在臺灣販賣裁縫機，不過其實也他們公司並沒有在台灣的代理店。到了1930年中期，日本的裁縫機公司開始招募在臺灣的裁縫機販賣代理店，像車樂美裁縫機公司在1936年，接著パイン裁縫機公司也募集代理店。

1920年代後期開始在臺灣推銷日本國產裁縫機，到1930年中期開始出現車樂美裁縫機的廣告，日本國產裁縫機開始在臺灣開設代理店。從一年之後的報紙廣告可以知道，車樂美在臺灣的代理店增加，確立以北部地區為中心的裁縫機販賣規模。另外，車樂美多刊載廣告的パイン裁縫機， 1936年在《日日新報》刊載廣告，內容為募集在臺灣的代理販賣店。他們兩家公司的廣告最多為1940年，1940年之後出現比較多的裁縫機廣告就是三菱、brother、三陽等三家公司。

但是1938年左右的裁縫機廣告內容可以看出有意識到時局變化的動態，比如提倡節約衣服，有裁縫機的話，婦女的一生有保障等。到了1943年（昭和18年）9月的時候，三陽裁縫機刊載小篇幅的廣告是在《臺灣日日新報》中最後可以看出的裁縫機廣告。

**3.學校與裁縫機**

1919年臺灣教育令發布之後，女子的實業教育機關很快設立，可以說1920年代頻繁地討論家庭對於女子教育影響的時期。其中最大的論點是家庭生活的改善，以前的婦女花許多時間在家事上，但是為了社會改造，婦女應該十分注意孩子的教育，首先從改善服裝的簡易化來進行家庭生活的改善。但不能說1919年之前完全沒有洋裁教育，大橋捨三郎，〈臺灣公學校六個年程度裁縫科教授細目案〉中也有提到裁縫機，雖然上課所縫製的東西是臺灣服裝為主，但大橋認為第六年級第一學期開始盡量使用裁縫機，若可以的話，應用於衫褲的縫製。這是目前關於在公學校使用裁縫機最早期的記錄。另外，我們從公學校教師《黃旺成的日記》中也可以看到裁縫機在公學校的存在。

 黃旺成就職的新竹公學校在1914年（大正3年）時已經有裁縫機的存在。雖然黃旺成是男老師，但公學校的老師熟悉裁縫機的使用法，經常帶回去自家縫製自己的東西。他藉由老師的身份把學校的的備品帶回去使用，但學生應該不可以帶回去自家。不能肯定說全島的學校都有裁縫機，但是如下圖4-2-1是1915年（大正4年）在臺北大稻程女子公學校裁縫教學的照片，大多數的臺灣女學生穿兩件式衣褲的傳統衣，感覺跟洋裁無甚關係，但是照片的左下角可以看到有一個女學生使用裁縫機，其他的學生都是用手縫的情況。

其實，公學校的年紀可能不適合使用裁縫機，那麼高等女學校的裁縫機使用情況如何？根據榎本美由紀的研究，1930年（昭和5年）高等女學校的裁縫科，各學科教授方針並教授要項一覽，第三學年第一學期就有6個小時的裁縫機使用法，1938年（昭和13年）度，臺北市立家政女學校家政科，第一學年有每週15個小時的裁縫手藝，包含裁縫機使用法。1940年（昭和15年）度，臺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學科課程，第二學年每週4小時的裁縫課也包含了裁縫機使用法。1941年（昭和16年）度私立愛國高等技藝女子學校，從第一年級每週有19小時的裁縫和手藝，其中有裁縫機使用。因此可說1930年之後的高等女學校的課程中，每個學校都有裁縫機使用法的課程。由此可以知道，高等女子學校有裁縫機的設備，不過因為很多學生一起使用一台裁縫機的情況下，她們雖然學了裁縫機的使用法，但是實際上使用的機會並不多，有時候想要帶回家繼續做，不過家裡沒有裁縫機，因此一定要在學校做完才可以回去等等，偶爾讓學生很煩惱。

**4.學生的回憶**

 關於學校和教學現場實際使用洋裁和裁縫機的狀況，可以由高等女子學校畢業生的回憶錄來檢視。第三高女對於家事裁縫的回憶說：「裁縫課並不是教實用的東西，尤其是對臺灣的女學生來說，上課要做和服等不習慣的東西。」，因為母親也不是日本人，所以不知道怎麽做和服。和服的材料也要自己準備，高等女子學校有裁縫機的設備，不過因為很多學生一起使用一台裁縫機的情況下，她們雖然學了裁縫機的使用法，但是實際上使用的機會並不多，有時候想要帶回家繼續做，不過家裡沒有裁縫機，因此一定要在學校做完才可以回去等等，讓學生很煩惱。

**5.女性回憶錄中的裁縫機**

 日治時期的婦女如何拿到裁縫機，利用婦女的回憶錄的資料。鄭鴻生的母親施傳月，她第一次拿到的裁縫機就是父親送給她最基本款的手搖裁縫機。父親不答應施傳月女士去當洋裁店學徒，施傳月女士便開始利用有空的時間，看著雜誌上的洋裝圖版，無師自通地學起裁製衣服。父親一開始不贊同她去當洋裁學徒，但在希望能補貼家中經濟的前提下，還是讓自己女兒去學習洋裁技術。

 高張七女士1920年代出身於深坑的農業家庭，公學校念到五年級就離開學校開始幫忙家裡，婚後生活經濟也由她負責，婚後不久高女士到南門市場學習裁縫。高女士的家庭背景不是那麼好，因此雖然有去學習裁縫，想要開設裁縫店也沒有錢可以買裁縫機，所以她就去當煤礦工的工作，很辛苦的工作半年終於得到共用裁縫機的機會。從高女士的例子中可以看見，父親買給女兒的裁縫機，也可以說是父親對女兒的投資。學習紡織機的女性的共同點是為了補貼家庭經濟，並不是因只興趣或好奇買的東西，是一種投資婦女的方式。雖然裁縫機是昂貴的東西，但非常值得去投資，因為若能成功開設裁縫店就能將成本贖回，並轉虧為盈。

**五、戰争時期的裁縫機利用**

1931年（昭和6年）滿洲事變之後，日本國內軍國主義高唱，臺灣也逐漸受到影響。1937年（昭和12年）中日戰爭開戰之後，日本更積極的準備南進，臺灣總督府認為臺灣是南進的重要據點，加強推進皇民化政策。除了精神方面以外，物資方面也受到影響。戰爭末期，民間物資日益匱乏，總督府開始實施配給制度、勞動服務。女性主要負責的部分就是戰爭後方，盡全力支持士兵所需。

**1.職業介紹所**

以愛國婦人會為主所設立的職業介紹所叫「授產所」，主要開放給生活環境較差的家庭婦女，以學習國語兼教授裁縫技術，幫助其家庭經濟與就職自立，以及改善陋習、提升品味為目標。愛國婦人會授產所在戰爭時期下更發展、擴大她們的事業，其實在滿洲事變之後，她們也開始召開裁縫機講習會，這種講習會也很受歡迎。愛國婦人會非常需要裁縫機，後來許多人的幫助的結果得到174臺裁縫機，其價值大約25740圓，裁縫機一臺平均150圓的價值。分配各個地域的結果，臺北市的數量最多78臺，接近一半的裁縫機在臺北使用，最少在台東4臺，北部地區與其他地區的數量，有謂明顯差異。

**2. 戰後方的婦女**

戰爭越來越緊張，男性在第一線打仗，另一方面，女性在後方支援男性。她們主要的工作之一是軍用品的製造與修繕。《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6月29日曾刊載，員林郡進行製造皇軍慰問愛國襯衫的情況，幹部二十名製造愛國襯衫的計劃。在當中提到裁縫機的數量。他們募集郡下擁有裁縫機者不管內台人，結果總共有1328臺的裁縫機。以員林郡為例，以臺灣家庭為中心的郡竟然有1328台的裁縫機，而且大部分是家庭用的裁縫機，由此可知1938年的時候，裁縫機已經普及到臺灣很多家庭之中。

戰爭時期不管日本人還是臺灣人都要參與勞動服務，她們製造的東西並不是新的軍服，而是修補已經弄得破破爛爛的軍服，可知戰爭之下資源嚴重不足的情況。因為物資非常缺少，尤其衣料的部分也開始配給，所以當時的婦女一定要有修繕衣服的技術。